



[美]阿尔方斯·黑克 著

# 希特勒 青年團骨幹 懺悔錄

四川文艺出版社

[美] 阿尔方斯·黑克 著

希特勒  
青年團骨幹  
懺悔錄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成都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张蕾

封面设计:文小牛

版面设计:史晓燕

书名 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

定价3.10元

---

作者(美)阿尔方斯·黑克  
译者王涛 王明春 刘春 陈雄 ISBN7-5411-0859-6/I·793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数1—7.592册

印张7.125

插页2

字数154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第一章

十岁那年，我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组织——少年队，至此，我的童年时代也便结束了。从那以后，我们这些小孩便成为了第三帝国（指1933年至1945年的纳粹统治的德国）的政治士兵。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六岁的小孩一上学就得接受一种基本训练。对我来说，那是在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刚当了三个月的元首，对他早年的统治，我的头脑中只有孩子式的追忆，但我清晰地记得：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过我的家乡时人们的那股狂热劲，这期间德军从可憎的法国军队手中收复了莱茵河地区，法军早已撤离了。

我出生在威特利希，一个产酒的小镇，离莱茵地区摩泽尔峡谷的法国东部国境线只有25英里。我的祖辈在1770年前后从法国的布罗道斯地区迁徙到这里，定居在威特利希这个小地方。到1933年，这里的人口仍只有八千左右，这个具有中世纪特异风貌的小镇现在是郡府和重要的贸易中心。

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废除了德国人对莱茵河地区

的军事管辖权，而且将莱茵河拱手交给法军长达十五年之久。法国（美国人对此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同意三千以下的德军重新进入精锐庞大的法军尚未管辖的地区，这实际上使希特勒取得了第一个不流血的胜利。在苏台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绥靖政策促使希特勒相信他是战无不胜的，可以不受惩罚地进攻波兰。这最终使五千万人丧生。

当然，对于1936年的威特利希人来说，对这样的结果是一无所知的。三月的那天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挤在集市上。旗帜随风飘扬。我坐在弗兰茨叔叔的肩上观看手持火把、身着褐衫的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队伍。人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探出身来，持续地暴风雨般地呼喊“希特勒！”这喊声淹没了人们已经一千年没有听到的陆军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对德国人来讲，与真正的军队进行曲阔别已有十四年了。这时，市镇大厅前停着一辆敞篷汽车，正是站在上面的人使得人们处于如痴如醉的癫狂状态，那就是元首！他伸着手，脸上挂着微笑，几乎精神错乱的人群对他表达了封建式的崇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元首，虽然许多年后我与他面对面，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天晚上他所唤起的狂热。一些平时见面几乎不点头、不还礼的冷冰冰的人也快把肺喊炸了。那天晚上，希特勒象征着新德国——这个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应有位置的高傲的帝国——是具有远大前程的。

与老人们不同，我们这些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孩子对魏玛共和国的自由生活以及正由于其自由的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社会秩序的紊乱一无所知，纳粹政体一旦确立，便从头到尾几乎没有阻力地修正了教育结构。我们受训不是从10岁被接纳加入少年

队开始，而是更早。在小学时就开始了。我们5岁和6岁时每天受一次国家主义的教育，像早餐牛奶一样，我们自然地吞了下去。还没完没了重复希特勒恢复了德国人的自信和骄傲，把我们从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曾把我们国家推入十多年血腥的政治骚乱的苛刻的条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即使在民主意识很强的国家，孩子们也不容易去怀疑老师教导的真实性的，除非他们的父母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年轻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塞给他们的东西。我们从没听到有异议的过激腔调，哪怕是一瞬间也根本没有怀疑过，我们自以为生活在这有光辉前景的国家是幸福的。

奥伯豪森是鲁尔工业区的一个大城市，我的父母移居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出生刚六个星期。祖父和祖母劝父母暂时把我留下，他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经过争论，父母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安下心来做生意，尤其是我的孪生弟弟罗蒂做过疝气手术后仍很虚弱，出生时我们俩一共只有6磅半。我猜测，在我们这个女性家长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的家庭中，妈妈是不敢反对祖母的。“暂时留下”一年后又延长了一年。母亲是一位温柔而孝顺的女人。三年后当祖母十分肯定地告诉她，她既不是一个好的家庭妇女，又没有经济头脑时，她就彻底妥协了。祖父和祖母为他们购买了杂货店，可这个杂货店第二年就倒闭了，当时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母亲把许多货物送给穷人的缘故。许多年后我发现不是母亲容易上当受骗而是父亲的无竞争意识断送了生意。但毫无疑问，母亲的确不是一个称职的家庭妇女，她特别缺乏组织才能，在家里她会同时匆忙开始做三件或四件事情，而不正经八百地完成其中一项。我的妈

丽婶婶既象一位不折不扣的图书管理登记员一样精细，又象普鲁士教官一样坚持原则，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一次她发现小弟睡在脏尿布堆下，而母亲为了找到他，却疯也似的从一间屋奔到另一间屋。

不管是祖父母，还是叔叔婶婶，从来没有把我看作是母亲的儿子，就像买一条狗，一旦带回家，它就会很快忘掉自己的妈妈。记得第一次见到母亲时我已经四岁了，她拥抱我，急切地吻着我并不可抑制地大哭起来。我挣脱她以后跑到高高兴兴的祖母身旁。那以后的十五年我与母亲的关系大致就保持这样一种基调，其间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我再也不能从她那里得到母爱了。不是我认为我出生才六个星期她就遗弃了我，相反地，我知道没有人能够勇敢地抵抗祖母铁一般的决心。祖母那时56岁，生了8个孩子，高5英尺，体重98磅，经常扛着一把铁锹。祖父在世时，在公共场合，她像所有德国人的妻子一样服从祖父，但对每一个重要事件的最后裁决人却总是她。有时这很不幸，因为我的祖父有更好的经济头脑。祖母最大的愿望是拥有土地和良种奶牛，是祖父劝说她应该在葡萄园下的地上种烟草，这在20年代初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主意。不到几年时间，这个主意就使得农场繁荣起来。当祖父决定给方圆二十英里唯一的一家电影院投资时，祖母大吵起来，祖父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策，其他的投资人在十年内便发了横财。

祖父死后，祖母的大多数决定再也不会受到挑战，只要与土地、烟草、牛有关的决定便很少出错。在德国这样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环境中，她是一位具有独立性并且取得了成功的女

性，尽管她受的教育很少。她虽然不会读与写，但她的许多对手发现她几乎从不上当。毫无疑问，她发现我母亲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却不可依赖，与她的长子结婚并不合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桩婚事是祖母安排的。

虽然我的父母亲一生相互理解，但他们都在34岁时才开始罗曼史的。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不能用罗曼蒂克这样的字眼来描述的。虽然这两人看来共同处很少，但无疑却相互都被吸引了。父亲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德国人：嗓门大，固执己见，勤勤恳恳，在女人面前充满了优越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堑沟中干了四年，虽然他为被称为“Front Schwein”（字面上的意思是前线的猪）而感到骄傲，但在通常情况下，他对政府却无好感，有的时候甚至对皇帝也是如此，因为是皇帝把他推上了战场。1918年德国被击败，在幻想破灭了的痛苦中，他很快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后来又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可以说是对祖父的不敬，因为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党内他并不积极，甚至很憎恶早期纳粹主义者（这是无处不在的右翼团体中对国家现状充满绝望情绪的一部分人）。1926年，当他开始向母亲求婚时，他仅仅是一位在农场里多年劳作而只有菲薄收入的人。因为是长子，他最终要继承农场，但那是20年以后的事了。不像他的弟弟，我父亲没有学过经营，而且20年代德国的经济环境这么差，在这样一个条件不错的农场中过着质朴的生活，对他来讲真可谓是幸事，但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战争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不会安于长期在农场呆下去。即使是被指定的继承人，比起农民来，他也好不了多少。我相信他与母亲结婚的部分原因是她会从父母那里继承一块有价值



的葡萄园。我外婆只有两个女儿，而母亲是老大。在这桩婚姻上，双方父母更多的考虑的是子女的感情，其间没有什么商业的因素。因为母亲又高又瘦，而且已经34岁了，所以她的条件（或是她父母的条件）没有父亲好。34岁正是理想的结婚年龄而且他还将继承一块好农场（虽然要等许多年）。我婶婶告诉我，这桩婚姻能成，主要因为我父母双方都感到需要自立了，因为他们几乎一直像农夫一样为他们的父母亲工作。我的外曾祖父同意卖掉他的一个小葡萄园来帮助这对即将成婚的年轻人做杂货生意，这样一来，他俩想要自立的愿望便有戏了。

其实，真正从这桩婚事中得到实惠的是双方的父母。我父亲因得到远房亲戚的一个商店愚蠢地放弃了对农场的继承权，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摆脱了一个不能赚钱的女儿（小女儿才是他们最痛爱的）。这样的婚姻刚开始几乎没有一点爱情，在德国，爱情也从来不是婚姻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婚后的岁月中，爱情并没有潜移默化地产生，但不管怎样它维持下去了。两个被遗弃的人都有着共同的生存目标，这正是他们能够结合的原因，而他们的婚姻也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应该说，这桩婚姻同许多其它的婚姻相比，还是满不错的，也许大多数夫妻都是这样生活的吧。然而，最大的得胜者是祖母，特别是祖父死后，现在她可以一人说了算，她可以把农场传给其他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她愉快地告诉家里人，一旦长子放弃了继承权，法律上并不要求她预定任何一个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然而，祖母还是最偏爱一个人，这就是我。“或许是因为她从母亲那里把你偷来的。”我的孪生弟弟罗蒂曾经这样说。但他也承认我是哥俩中的幸运儿。当他还在德国最肮脏地区的

公寓里生活的时候，我却由一个痛爱我的女人陪伴着在德国最迷人的峡谷之一过着舒适的生活。祖母要我接受教育，并给我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被父母遗弃的感觉已不再困扰我，我知道祖母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孩子，我最怕有一天她将我交还给父母。

那时莱茵省90%的人口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样，祖母决定要我成为一名牧师。这种信念也完全符合我母亲的心愿，虽然并没有人去征得她的同意。我九岁时这个计划开始实施。这一年我曾做过协助神父进行弥撒的男童，一共干了六个月，这算我最初参加的宗教活动了。对此，我只能逆来顺受。祖母为此花的钱却比嫁女儿花的还多，因为我们是那年唯一的双胞胎。我弟弟是在维特利希接受的宗教基础教育，而他自己的教区却在奥伯豪森，这六个月是我们兄弟俩在一起相处为数不多的一段日子之一，但我们却经常吵架。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是老大（我的确比他大15分钟）。

因为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太难管理，祖父母在暑假时把弟弟送到他们的小农场，那里出产水果和葡萄酒。现在看来，我们之间的不和完全是人为的，这无疑与祖母的偏爱有关。许多年后，弟弟告诉我他当时很嫉妒我的地位。然而不久，这些童年的困苦也都渐渐的淡漠了。

1938年4月20日是阿道夫·希特勒49岁生日。那天天气寒冷，狂风呼啸，我加入了少年队，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部份，成员都是少年。从1936年以来，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并且为受过教育的德国青年所敬仰，但这时不参加这个组织也还是允许的。1939年10月，帝国青年服役

法强迫每一个9岁以上健康的德国少年都必须成为其成员。这当然只是针对亚利安小孩而言的。有病的小孩是不能加入的，即使他们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行。那些智力低下的孩子和成年人则被送往无痛苦死亡中心杀掉。这种中心是政府秘密建立的，通常设在精神病院里。这些“Nutz lose Esstr”（只吃没用的人）被注射或用毒气处死，这也是一种“基础”的实验，为的是找出一种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迅速干掉几百万人的方法。

在我被吸收入少年队以后，尽管我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却无条件地接受了纳粹主义的两个基本信条：日尔曼人天生就是优等种族；全身心地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元首是它人格化的代表）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对我来讲，祖国这个字眼还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但我已经意识到她是非常神圣的，并且她正受到异常凶残的敌人的威胁。凡是自愿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都有这样两条共识：祖国至上，为日尔曼民族而战。阿道夫希特勒不停地向我们灌输这样一种感情：即我们都是他的忠实助手。希特勒极其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感情。在表达这种感情的时候，我们左手握旗，伸开右手的三个指头指向天空，宣誓道：

我发誓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时刻怀着敬慕和虔诚之心恪守职责，为元首效劳——也就是为我的上帝效劳。

紧接着，笛声高扬，鼓乐齐鸣，演奏起十分流行的《希特勒青年团颂歌》：

向前！向前！  
争取光辉的前程，  
为了自由和生存，

我们紧握着红旗星夜兼程。

歌词不断重复，没完没了，但它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也指出了我们的归宿：

我们的旗帜高于一切，死又何足惜哉！

我们在全身心地报效祖国，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这种感情只会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像入伍庆祝会、升旗仪式和在许多冗长烦人的讲演中偶尔听到一个精彩的段子时才会出现。像大多数十岁左右的孩子一样，我渴望着行动，而希特勒青年团正好善于组织五花八门的活动。早在被迫加入少年队之前，也就是还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渴望参加这类活动了。在那时的我看来，没有家里大人的管束，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真令人激动不已，整个训练课目包括行军、露营、野战演习和每天必须进行的体育锻炼。就像威廉·L·谢利尔在他的《第三帝国兴亡》一书中所说，在德国，到处都能看见孩子们行军的队伍，听到他们的歌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战前的活动与童子军相似，十分强调纪律和政治灌输。发给我们的生活用品和识别标志，加上宣誓时的盛大场面，以及充斥于其间的神秘主义韵味，使人仿佛置身于宗教仪式之中。参加所谓的“勇气测试”是我们必须经历的重要考试课目之一。通常是新队员入队六个月后，就要接受这项测验。我们分队大约有四、五十名孩子（像军队中的一个排）按照命令跳进了镇上那宽三米、深十英尺的游泳池。尽管肚皮被水击得很痛，但是当旗队长、我们那位15岁的头（他管着我们160多名弟兄，相当于一个连）将那柄我们追慕已久的镌刻着“热血与荣耀”的短剑授与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吃的苦仿佛就得到报偿了。接过剑

这一瞬间，也表明我们已测验合格了。

在希特勒青年团急剧膨胀以前，参加这个组织的就已有600万男青年和300万女青年，这个数字的确令人吃惊。这恰好证明这个组织在青年中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感召能力。尽管纳粹政府提出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口号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所有的德国人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可德国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但是，希特勒青年团却是一个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的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正是因为基于对所谓“劣等民族”的歧视和仇恨才产生了希特勒青年团，但这个组织内部的每一个成员却的确享受着平等的权利，这个组织的大多数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的一个上司是一位勤劳的工人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志同道合而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一块共事。我们中间许多人的父母并不赞成不论贵贱，均皆兄弟这样一种观点，当然这只能加剧我们与大人之间的隔阂，但他们最终却不得不臣服于我们，准确点说，随着我们手中权力的膨胀，大人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望而生畏了。然而，在1938年我仅仅是一个少年队队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我童年时代第一个朋友是海因茨·埃纳曼，他的父母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条街上做家畜生意。海因茨几乎与我同龄，我们是在幼儿园里认识的，在那个时候要建立真正的友谊，我们的年龄好像太小了些。我们之间相互吸引之处在于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跳伞衣，大概还由于在某天下午我俩筹划好到一个肮脏的泥坑里打滚，并为此都挨了疼爱我们的姑娘的一顿好打的缘故。幼儿园放学后，我常到海因茨家去，不久，我发现他的

母亲不知为什么特别讨厌做饭。他的婶婶埃娜和叔叔西格弗里德比我的叔叔婶婶，甚至比我祖母都要宽容得多。我的祖母就从来没有像他的叔叔那样与我们一起打弹子。西格弗里德照看牛群、海因茨父母管生意。有些人在他们的牧场上打工，或者放牧，或者照看幼仔，这些人互相吆喝着，牧场上颇有生气，在我的家乡买卖通常在握手言欢中成交，万能的烈酒，清澈透明，没有掺过水的葡萄酒和白兰地是交易中的润滑剂。西格弗里德的木头假肢使我很好奇，它是1914年萨姆战争留下的纪念，在那里，西格弗里德以其超人的勇敢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他以为祖国奋斗而骄傲，但结果是祖国并不以他为自豪。在他教会我玩弹子和正确地坐在马背上的13个年头以后，西格弗里德和整个埃纳曼家族却因为是“劣等”的犹太人而遭迫害。

除了那位尽管对命运具有惊人洞察力但却精神错乱的预言家，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的悲剧什么时候降临。当希特勒的权力如日中升，日益膨胀的时候，50万犹太人（不到德国人口的1%）虽然也觉察到苦难随时都会降临，但仍对针对他们的镇压计划的残酷和激烈毫无思想准备。大多数人认为他们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尽管希特勒把过去的一千年中每一次降临在德国的不幸都归罪于犹太人，他特别强调正是因为犹太人策划了左翼分子在大选后的逃跑才导致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但许多人仍然认为一旦希特勒取得了对国家合法统治权，他总不会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国民。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为了上台才将犹太人当成替罪羊，他所表现出的对犹太人的狂怒多半是为了争取选民而做出的政治姿态，一旦他登上了

宝座，就会雨过天晴的。其实，他们大错特错了。希特勒在许多问题上出尔反尔，但从来没有在“犹太人问题”上改变过主意。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持久的，彻头彻尾的，像着魔似的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1933年4月，海因茨和我一起上了小学，那是在老总统冯·兴登堡会见了希特勒总理后三个月，兴登堡相信希特勒能够制止共产党煽动的政治骚乱，几乎在同一个月，政府通过了维持学校秩序的法令，这是针对犹太人的。在我们班上，海因茨和其他几个犹太学生被开除了，从那时起，他们只能在犹太教堂隔壁杂屋里由犹太教士和其他犹太老师授课。我很悲伤，每天早晨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去上学了，这对我来讲是件悲哀的事。但对海因茨来讲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那位待人十分严厉的老师赫尔·贝克尔马上就要将犹太学生与我们分开来授课了。对这位贝克尔我们历来都很畏惧，每当他喊一声：“趴下，受罚！”我们的呼吸都粗了许多。

战前德国，小学低年级学生的父母是希望老师惩罚他们的孩子的。如果在学校挨了鞭打，在家里也别指望得到同情。相反，任何抱怨将会招致再次尝尝鞭子的滋味，大多数父母认为赫尔·贝克尔当自己孩子的老师是幸运的，他的为人十分苛刻，他教过的班里，后来当了运动员的倒不少，当然，他们的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了。

赫尔·贝克尔或许从没有听说过儿童心理学。他启发孩子的方法很简单。他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并在作业簿上千篇一律地写道：“如果明天我发现你没有准备好功课，我要打你个鼻青脸肿。”因为他说话算数，我们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如果

他认为那些智商稍低的孩子是努了力的，那么，对这些孩子成绩不好他一般都还能谅解。这种时候，他总是耸耸肩，用歌德的话感叹道：“上帝对愚蠢也束手无策。”假如赫尔·贝克尔说某个孩子是聋子的话，他的父母就甭指望这孩子能升高中了，他也就只能认命，去做修鞋匠的徒弟了，他预言我当一个牧师没有问题（主要在智力上），这使我的祖母很高兴。但他宣布这要等到我在军队里服两年役后才行。

贝克尔先生是一个纳粹党党员，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我的家乡这样身兼二任的人不算多，即使在政府公开地采取排犹政策以前，他就坚持犹太人是下贱人种的观点，对此还毫不隐瞒。1935年9月，纽伦堡种族法令颁布以后，这种上百万德国人拥有的偏见，很快成为公开的仇视。从那时起，犹太人在法律上便不再被承认是德国公民，而成为卑贱的下等人。贝克尔在每周的“种族科学”课中都要阐述犹太人为什么和怎样与我们不同。他说：“你们注意他们的鼻子，如果像一个倒置的阿拉伯字母6，那么十拿九稳，准是犹太人。当然，有的犹太人用卑劣的手段与我们通婚后，他们的后代的这种特征或许就不明显了。”我在想，海因茨或许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他的长相与雅利安人非常相像，甚至比我这法兰西血统的德国人更雅利安化。就海因茨而言，我敢肯定他之所以如此，决不是犹太人耍了什么花招，至于别的犹太人，我可不敢这么断言。

奇怪的是，贝克尔先生很少像对待我们那样揍犹太孩子。相反地，他让犹太孩子坐在角落里，并鄙视地称之为“以色列人”。他从不向他们提问，在我看来这是幸事。但很快我意识



到这是他想让我们也蔑视犹太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种族歧视，我感到不知所措。一天，那位我们一睁眼便感到其权威所在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突然宣布，犹太人是毒种。我马上意识到，海因茨一家再不能与我们在同一个教堂祈祷了。1932年春海因茨的婶婶结婚时，我们全家被邀请到天主教堂参加庆祝会，又到埃纳曼家中参加了婚宴。祈祷人那些稀奇古怪的祷词令我迷惑不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犹太人在教堂里还要戴上帽子。

在我们家农场的餐桌上也弥漫着憎恶犹太人的谈话。我的叔叔弗兰茨没有仔细检查便从埃纳曼那里买回一头小牛，吃饭时挨了祖母好一顿数落：“如果不讲讲价钱，你怎么能买犹太人的东西，蠢蛋！”每次讲话中只要有“蠢蛋”这个词的时候，祖母总是唠叨个没完。“他们也希望与你讲价钱的，否则，他们才看不起你哩！”当然，祖母这样说也并不是出于恶意，仅仅是陈述了一种基本事实而已。我的祖母不仅对埃纳曼家的牛的质量毫不怀疑，而且对这一家人也颇有好感。

所有天主教徒的孩子都知道是犹太杀死了基督，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犹太比新教徒还要坏（尽管当牧师来我们学校布道时，新教徒们也不得不离开教室到一旁呆着）。一天，我问海因茨为什么他的祖先要杀死耶稣，他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我确实不知道。他虽然是犹太人，但这件事一定是罗马人让他干的。他有野心，想当皇帝。”这看起来是个充足的理由。但打那以后，我对宗教便索然无味了，这种状况直到碰上了那位虔诚的爱国者贝克尔后才有所改变。

由于青年人的健忘，我对海因茨的印象很快便淡漠了。贝